



## 八 无法拒绝的隐忧

20世纪80年代的结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大震撼，痛苦之后是失语，失语之后是缄默。新时期的文学狂欢节的谢幕，宣告激情时代的终结。伴随着90年代而来的是建立在冷静反思基础上的静悄悄的调整。以往的历次调整都是一种强加，而这次却是自觉的、也是一次良性的调整，没有号召，也不依赖那种无根的“批判”，甚至也不理睬宣传的喧嚣。

当然，商业狂潮的袭击干扰了这种平静。但商业性的影响显然被宣传夸大了。我知道严肃的作家和学者仍然坚持在寂寞和清贫的一角，他们“临渊”而不“羡鱼”。从根本上看，文学的轰动是反常的。文学之引起轰动，多半是由于文学做了别的什么，而文学的常态则是受到社会中心的冷淡。股市和金融，政治和战争，甚至一个女明星的隐私，都可以造成轰动，而文学基本上不能也不为。文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调节，从长远看是一种滋润，而总与急功近利无缘。因而文学的天命则是自甘寂寞。

在接近百年终了的庄严时刻，回想一百年前那一代中国志士仁人如何用苦难来谱写那个世纪末的悲壮乐章，我们就没有理由用玩笑和肤浅的态度对待人生和文学。我们希望少一些噱头和脂粉气，多一点严肃精神。眼下闲适太多，调皮和花鸟虫鱼太多，刺激太多，少的是沉雄博大感世忧时之作。19世纪末的忧患消失了，代之以及时行乐的浅薄轻浮。人们！难道金钱和权力把中国所有的良知和正义感都挤压掉了？

在中国，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不是太多，而是他们要么漂泊和流浪他乡，要么隐居避世。一些应当是雄姿英发的盛年才俊，却在心理上和艺术上充满了“老态”，他们的颓唐甚至让我们这样年龄的人都感到吃惊。

十年的奋斗，我们争来了一些心理和情感空间自由度，但是我

们的不少文学家却在无谓地荒废和抛撒这些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自由。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了真正的末世的哀音，听到了在珠光宝气的言辞包装之下的庸俗和浅薄。相声是纯粹的语言艺术，它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的机智和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我对相声艺术和相声大师充满了敬意。但眼下相声的粗鄙化和庸俗化已让人感到了这一艺术的可怕的沦落。更可怕的是，它的粗鄙和庸俗风气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蔓延，许多的节目主持人，许多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染上了这种“相声气”。某一个夜晚——其实是所有的夜晚——你打开电视机，随处可见小市民情趣的废话和无聊的泛滥，还有所谓的戏剧小品，从南到北的几个“幽默大师”的逗乐。喜剧不是喜剧，丑角不是丑角，把中国人的麻木和痴呆再现得活灵活现，在他们的演出中，鲁迅痛苦的鞭笞变成了兴高采烈的肯定！

还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下的明确无误的复古空气。从娱乐式的祭孔表演，到再建《金瓶梅》中的狮子楼，再到西门庆的家宴菜谱。所谓的“旅游资源”的开发，随处可见的御酒、仿膳、宫廷秘方，使我们周围充满了腐朽颓废的空气。这一切窒息着我们，无情扼杀着残留的哪怕一点点生机！

有人批判“五四”的激进思想，以为中国现今的弊端与那个激进思潮有关。我们可以承认那一代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激烈态度有片面性。但也许其中就蕴涵了他们的睿智和投入精神。我想发问：面对这一浪高似一浪的颓废和妥协，面对不断制造出来的古董或假古董的“肆虐”，较之那些浅薄平庸的“全面性”，那充满崇高精神的愤世嫉俗的激烈，不是显得更为可贵吗？

（原载《作家报》，1993年12月4日）

